

收稿日期:2024-10-15

从赖传珠日记看新四军的精兵简政

柴玉振

(中国人民大学 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精兵简政是抗日战争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实行的重要策略。赖传珠日记中的连贯记录展现出新四军当时面临的军需物资紧缺、财政经费困难、活动空间缩小等实际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四军高层结合中央指示和自身特有情况,以“定编定人”为基本依据,对部队进行缩编、裁员和重新编组,部队的结构和层次呈现主力地方化的特征。同时,赖传珠日记也有部队精简后人员处理的相关文字记录,如组织善后委员会等具体措施,在干部疏散过程中的细节和案例等。赖传珠日记为还原和体现新四军开展精兵简政的背景、过程、方式等提供了一条特殊通道,值得去挖掘和总结。

关键词:赖传珠日记;新四军;精兵简政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5)01-006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高校党的建设历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19ZDA012)。

作者简介:柴玉振(1998—),男,山东济南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5.01.006

赖传珠(1910—1965),江西赣县人,新中国57位开国上将之一。他十七岁投身革命,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不同阶段,长期从事中共军队的军事和政治工作,亲身经历了许多重要的革命事件和战役。赖传珠日记记录了赖传珠从1934年10月16日参加长征起,至1952年8月20日期间较为完整的记事,共80余万字。日记内容涉及赖传珠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真实记录了许多重大革命事件、重要领导人的言论和行动,特别是详细记载了新四军的军事、政治、后勤等各项工作情况,是研究新四军历史的重要一手史料。这本日记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连续性强、史料价值高,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精兵简政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十大政策”之一,为中共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与研究八路军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相比,针对新四军精兵简政的专题研究尚有不足,更鲜有研究者从解读亲历者日记的角度去深入探讨此话题。赖传珠时任新四军参谋长,通过其日记来观察当时新四军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和开展精兵简政的历史过程,这一视角的转换可以带来新的学术收获,对全面了解抗战时期的精兵简政具有特殊意义。本文以赖传珠日记为核心史料,兼采其他类型文献材

料和革命回忆录，力图复原关于新四军精兵简政的若干历史细节。

一、赖传珠日记所见新四军面临的困难

1941年至1942年是新四军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日寇集结重兵先后对苏皖等地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企图用政治、经济、军事等立体多维的手段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将中共武装及政权逐渐围困死。物资和经费是坚持抗战活动的基础。从赖传珠日记看，新四军的财政经济在这一时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敌我力量的客观形势是新四军深入开展精兵简政的直接原因。

（一）军需物资紧缺

赖传珠身为新四军参谋长，担负着具体协调新四军后勤保障工作的重要任务。从1941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对敌斗争环境的不断严峻，赖传珠日记中频频出现关于讨论各种财政经济具体问题的记录，这其中尤以电料、粮食、药品等军需物资最为短缺。

1941年9月19日，赖传珠记：“电料很难解决，无论如何要设法购买才行，将来大战爆发后，更难解决。”^{[1]450}11月19日又记：“要张元培来商讨粮食搬运办法。全军尚需补充250万斤粮食，才能供给到明年春季。”^{[1]471}而随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赖传珠的担心更为加重，这在他的日记中有直接描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赖传珠在两天后的12月9日记录道：“因为日、英、美战争爆发，购买西药及电料等，必将更加困难，要各部队注意收购，以备将来之需。”^{[1]478}刘少奇当时也对此问题非常敏感，在华中局会议上明确强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寇完全封锁中国各敌后根据地是可能的。因此，应迅速准备对策。否则，将受极大的窘迫。”^{[2]120}

赖传珠是新四军军部具体负责军需储备和分配的负责同志。在整个12月份，赖传珠通过写信、电报等方式数次组织调度电料、药品等急需物资的购买和运输。如在12月10日记：“去信崔[义田]、戴[济民]部长设法再买些药品。”^{[1]478}两天后又记：“要谭[启龙]代购电池及电料等问题。”^{[1]479}16日和17日连续两天部署购药问题，16日记：“写信崔[义田]、戴[济民]部长关于买药问题。”^{[1]480}隔天17日记：“崔[义田]部长来商讨购西药问题，叶[进明]副部长来谈供给及运输工作。”除以上几则工作日记的直接记录以外，日记中还多次有“催促买药、电料问题”^{[1]485}的字眼。当时在新四军采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也曾写道：“因了日胜一日的急迫需要，沈医生和吴医生已经离开了这儿，去弄药品。实际上，我们什么都缺乏，同时我们急需要东西，不仅是为了现在，同时还为了将来一旦我们与外界被截断而孤立的时候。”^{[3]279}这些足以反映赖传珠这段时间对于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急迫心情，同时也从侧面说明军需物资的供给在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下确实遇到了很大困难。

其实，相较于其他地区的中共部队，新四军活动的地理区域在位置上更靠近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按说部队的军需后勤工作会更好做一点，尤其是医药卫生方面。担任过新四军第三师卫生部部长的吴之理就回忆：“新四军的卫生工作比八路军活跃。原因是新四军靠近上海、南京，便于买药材和医学书刊。”^[4]但从赖传珠在日记中的记述来看，这段时间新四军还是出现了西药、电料等军需物品严重短缺的情况，这与敌人实行严密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封锁直接相关。

赖传珠在1941年11月19日的日记中提到：“东沟（六合以东）被敌占领，税收、购货甚为困难。”^{[1]471}不久又记：“敌人专调查我地区之粮食及兵工厂，这是企图消灭我生存条件。”^{[1]519}时任淮海区地委书记的金明在其所作的工作报告中直截了当地描述了这种情况：“敌对我采取经济封锁，成立了经济封锁委员会，许多条例都是对付我们的。敌人的宣传是封锁共匪区，组织兴亚合作社，实行物资统治。老百姓购东西多少都有一定限制，特别是军需品，如发现运枪枝、伤药品、

凡士林等即枪毙。洋油的封锁也很严。”^[6]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也总结日寇当时在经济上的政策具体表现为,设立统制委员会,以统制一切物资。同时,加强对我封锁,使我物资困难。凡是敌伪可利用的东西,都全部抢了,甚至将桌子等家俱木器也运至上海,其不要的就把它毁了^[6]。客观的情况使得新四军军需物资的获得空间不断地被压缩,以至于真的出现了药品被截的事件,赖传珠在1942年6月5日记:“从上海运苏中的西药45箱,全被敌抢去了。”^{[1]585}

解读赖传珠日记说明,他这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就是调度解决新四军的军需供应问题,这些军需物资的获得本就稀缺敏感,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很大变化的条件下就变得更加困难,这些情况在其日记中都留下了连贯的工作记录。

(二)财政经费困难

新四军的财政经济工作一向就是在敌伪顽三方包围和封锁的状况下进行的。随着干部战士的增多,新四军的经费收支情况出现矛盾,而1941年和1942年敌伪策划实施的“清乡”“扫荡”让这一问题愈加凸显,处在军部领导层的赖传珠在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早在1941年8月24日,赖传珠就记录道:“开各级首长会议,传达说明经费困难及研究节约经费的办法。”^{[1]441}随后9月19日又记:“了解七师干部多,经费浪费很大,500人之团须8万元之开支,打电话告黄[克诚]师长,苏中经费无着落,要自力更生。”^{[1]450}10月初再记:“早饭后,黄[克诚]师长来谈经费及独立旅冬衣问题并报陈[毅]军长。”^{[1]454}这几则日记说明,在1941年下半年新四军的经费就已面临严重困难。而经费短缺导致出现的首要问题就是部队过冬的冬衣无法解决,这让新四军的“大管家”赖传珠心急如焚。

他在1941年9月20日记:“苏中经费很困难,冬衣费尚无着落。”^{[1]450}几天后的9月24日又记道:“到三师参加财政经济会议。三师尚欠制冬衣经费31万元,每月共需经费475000元,现只能得35万元,淮海区再筹集一些,尚欠不多。拟拨10万元交三师缝衣服。粮食情况很混乱,讨论无结果。”^{[1]450-451}冬衣问题对于新四军的后勤保障来说一直是重中之重,一些曾在新四军短暂生活过的记者对此有过特别描述。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就曾写道:“这儿天气是冷得刺骨,而我们没有钱来做棉衣,甚至于军队本身都没有衣服,只五分之二的人有毯子盖。”^{[8]280}当时的《华美》杂志也报道:“但到冬天棉衣问题来了,棉衣要军部里每人发一套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皖南的天气比上海冷得多,所以又必须想法解决。最近他们发动了一个棉衣运动,就是把如何解决棉衣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讨论问题,每一个单位都讨论。”^[7]由此可见,在敌伪军进行强力“扫荡”和“蚕食”的背景下,“冬衣困难”不仅在赖传珠的工作日记中有直观鲜明的呈现,同时也是很多人革命记忆中印象深刻的一段往事。

这种情况持续到1942年仍没有很大改观。赖传珠在1942年7月20日记:“开各部首长会议,传达一些问题并讨论执行之。发觉冬衣困难,八旅需冬衣费120万元不好解决。物价高涨,民力负担太重,经济来源困难。”^{[1]547}随后在8月18日和8月24日两次记录道:“宋[裕和]部长来谈经费、冬衣等问题及其解决办法。”^{[1]556}这里提到的“解决办法”中就包括军部对于新四军各师的统筹调度,互相帮助。赖传珠曾在日记中明确写道:“写信致二师、七师。七师送来的款已到一部分。要二师把款全数送来应急。”^{[1]516}不久又记:“要七师将款全部送来……所到8万元款,分配给三师4万元。”^{[1]517}时任新四军第七师供给部部长叶进明的回忆印证了赖传珠日记中的这一细节:“7师代师长傅秋涛同志欢迎军部派员来7师筹饷,和我见面的第一桩事就给我看了军部电令:‘急速筹集大批款子、布匹和药品,赶运苏北军部,以应冬需。’”^{[8]47}可见,在物资和经费处于严重困难的局面下,赖传珠作为新四军的参谋长积极进行调度,各师为共同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也能够相互支持,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具有相互支援的大局观。同时,赖传珠

日记的详细记录充分说明敌后抗战进入艰苦困难的阶段后,精兵简政确实有着鲜明的问题导向,这一点在日记中的许多细节处能够得以具体清晰地呈现。

(三)活动空间缩小

“精兵”是精兵简政政策的重要一面。从赖传珠日记和其他一些历史资料看,“精兵”的提出和落实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客观战争环境所做出的一种必然选择。日伪军高强度的“清乡”和“扫荡”迫使新四军各部必须作出调整。1941年8月5日,赖传珠记:“13时召开各部门首长会议,决将直属队缩小些,以便应敌‘扫荡’。减去的人员补充二旅,以攻击伍佑、盐城。”^{[1]435}第二天又记:“开军分会,讨论直属队组织问题,以短小精干为原则。”^{[1]435}这里实际上说明了“精兵”的目的和原则,那就是为了应敌“扫荡”而要“精干上层,加强下层”。

在这一时期,敌人的分区“扫荡”和反复“扫荡”致使新四军的活动空间逐渐缩小,而想要坚持作战就不得不划小作战单位,同时加强和充实一线基层的战斗力,以求战术上能够做到灵活机动。时任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政委的江渭清在谈到部队工作即将面临的困难时,首要提出的就是“地区缩小了不利于我们的转移穿插。如果敌人来一个全面的‘扫荡’,部队转移是很困难的”^{[9]240}。刘少奇也根据当时敌顽情况的变化作出新的形势判断:“今后的战斗形式,主要的仍然是对敌的分散游击战争。”^{[2]108}而“分散”二字就是对在高压形势下新四军作战特点的高度概括,这也倒逼中共党政军的组织体系和力量配比必须适应这种艰苦的斗争环境。

因此,中央明确指出精兵简政包含两方面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要求从战争与农村环境着想,注意组织精干,分工合理,使政策能贯彻下去,使工作效率能大大提高,使军事行动能灵活便利。”^{[10]376}华中局在发文宣传贯彻的时候也多次强调:“如果在今天新的环境与新的艰苦条件下,仍留恋着旧的组织形式和机构,而不愿按照中央去年十二月一日的指示彻底实行精简,简直是自杀政策。”^{[11]194}

1942年和1943年,这种形势愈加严峻。赖传珠在1942年7月18日记录了这样一个情况:“上午听五师的汇报,情况相当严重,所有中心地区已被敌顽进占,形成了对我大包围的局面。已将处置意见告他们,并请军委直接给五师指示,因为我们没有地图,电台联络不畅,难以指挥。”^{[1]546}在一线指挥部队的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在日记中写道:“电台由于彼不行动此即行动,往往联络不到,万万火急的电报经常发不出收不到,真是急人!”^{[12]44}在新四军第五师从事电台报务工作的潘流也直接记录了这一情况:“环境迫使我们又离开了小悟山、范家冲、晏家冲这一区域,我们又到陂安南、塔耳岗、棺材山脚俞家冲一带了。最近顽军到达蔡店附近,敌人在黄冈清乡,增设据点,把我们活动地区缩小了;而且这里附近敌据点黄陂等处增兵,处处威胁着我们;这种形势的紧张,据说比三次反共高潮最高潮时还严重呢!”^[13]

以上几则材料从不同角度说明,当时严峻的外部压力使得新四军的活动空间大大被压缩,部队之间的通讯也因此而受阻,这种情况非常不利于大部队的移动和作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减少指挥层级,化整为零,就地作战。《解放日报》的社论就解释道:“今天我们要坚持敌后斗争,一定要实行精兵政策,划小作战单位,充实战兵团战斗力,符合战术上灵活机动的要求。”^[14]彭雪枫、李一氓等新四军的重要将领更是对此印象深刻,都曾表达过相同的看法。彭雪枫就说:“我们已将党政军各级机关重新调整,与敌长期坚持。精兵简政,过去只是说而不行,此次敌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个大问题,不能不感谢它!”^{[12]46}李一氓也总结道:“过去,去年‘扫荡’前舍不得精简的,‘扫荡’一来,事实上教训了他,不得不痛快地精简一番。”^[15]

由此可见,反“扫荡”和反“清乡”的严酷斗争环境,要求党政军民机关必须实行精简以便于隐蔽和转移,灵活机动地与敌周旋。当时新四军的一线部队为适应客观要求、保存自身力量已经对

“精兵”有了一些自发的尝试和探索。这种根据战争实际所作出的调整具有鲜明的现实考量,后经党中央在政策层面的系统总结和推广成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中国共产党应对敌伪的一种独特经验和方法。

二、“定编制”与“主力地方化”

精兵简政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掌握人员的走向,具体来说就是对现有人员的再分配。在赖传珠的日记中,我们既能看到中央对此问题的指示要求,也有新四军军部基于自身特有情况而作出的调整。

(一)“扩充”还是“精简”

1942年4月,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下发关于总结精兵简政经验的通知,要求各地向中央报送有关情况,其中在关于“组织精干”方面,第一项就询问“党政民各级原有脱离生产人数及执行精兵简政政策后新编制人数”^{[10]378}。这是中央对各地精兵简政执行情形的一次调研,询问的问题主要聚焦于人员编制的规模和比例。陈毅随后便向中央报告了华中的情况,他在电文中列举了华中在执行中央指示中的各种倾向,其中一项为:“华中人力物力之调征,并未达到饱和点。除淮南津浦路东地区外,一般均未达到中央关于脱离生产人数不得超过总人口百分之三的规定,华中主力仅八万人,地方军仅四万余,相当的扩充仍属必要而且可能。”^[16]陈毅的报告反映了有些党政人员基于片面理由强调华中敌顽环伺,主力尚不足以应付的特殊情况,他们对于精兵简政的重要意义还认识得不够到位。

毛泽东后来专门就这个问题给华中复电,深刻说明了未来一段时间形势的严峻。赖传珠在阅读完这个意见指示后,在1942年8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看毛[泽东]电,谈精兵简政问题,明年的斗争还要艰苦,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切实的步骤。”^{[1]533}从赖传珠的日记记录看,毛泽东在电文中强调了精兵简政的重要意义,并要求其拿出切实的方案步骤。事实上,毛泽东的回电具有强烈的回应性,主要是针对前述陈毅所呈报告中强调华中特殊性的错误倾向。他明确表示:“但有一点须请你注意,即伴随着极端残酷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而且可能很快到来,这一点如不预先计及,将来必要吃大亏。在此情形下,不论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军队,如愿勉强维持,必难持久。”^[17]并在电文最后给予要求:“华中情形虽略有不同,但总方向是相同的。此事请你愈加考虑,到年底或明春作一通盘计划,达到精简目的为盼。”这样的互动呈现了华中与中央在精兵简政方面的讨论过程。

毛泽东的这封电报对新四军以及华中地区的精兵简政工作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赖传珠在1942年9月10日记:“上午到军长室开会,讨论在饶[漱石]主任回来后,于20日左右开一次精兵简政会议,以贯彻中央指示。”^{[1]560}随后,赖传珠在日记中多次提及他在为准备精兵简政会议所做的一些工作,比如准备会议内容、撰写会议提纲、讨论精兵简政的具体规定和最后方案,并多次与陈毅、饶漱石以及各部门首长讨论相关问题。这些连续性的文字是对新四军军部筹划精兵简政工作的宝贵记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四军高层进行决策的酝酿过程,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新四军的精兵简政工作在接到中央的专门指示后确实明显加快了进度。

(二)“缩编”与“裁员”

中国共产党开展精兵简政是一个自上而下有序推进的过程。当时提出并大力宣介的首要“精兵”办法,就是要“调整编制,一方面缩减编并某些单位,另一方面认真充实连队战斗力”^[18]。新四军也不例外,作为新四军决策层的关键一员,赖传珠在他的工作日志中多次记录了

审阅编制表的情况。比如，在1942年6月6日，赖传珠记：“上午审查整个编制表的问题。”^{[1]585}11月2日、3日连续两天“审阅编制表”^{[1]575}，11月4日又记：“编制表已整理完，正在付印中，拟明日公布。”^{[1]576}这几则日记说明赖传珠具体负责新四军精兵简政的编制规划工作，他所审查的“编制表”在精兵简政的背景下要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调整，并且与之前相比经过了不同程度的缩减。因此，“定编定人”是新四军干部人员精简的具体办法和基本依据。

新四军主要负责人对“编制”问题非常重视，陈毅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就军事建设提出的第一要求就是有关编制工作的。他认为部队编制是战斗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并明确指出要“经常能根据编制表来检讨人员马匹公物的配备，增减和调动，均井然有序，在最不显著的角落，进行特别仔细的清查，这是部队行政首长及其司令部应负的责任”^{[1]159}。这里点明了“编制”对于人员增减和调动的重要作用，“编制先行”也成为新四军直属队及各地方部队推进精简的首要之举。在这一点上，一则当时对淮北行政公署精简工作的报道记录得更为具体细致：“确立了处置编余人员原则与工作作风，并在会议上一处一职地详细讨论，确定新的编制表。其次，各处根据刘主任的报告及新编制表，分别开会动员，重新配备人员。”^[19]

赖传珠作为新四军参谋长大多数时间在军部工作，他在日记中对新四军直属部队和军部勤杂人员的精简多有记录。比如针对非战斗人员的精简，赖传珠在1942年10月15日就记：“我决定取消一个勤务员，设一个值班通讯员，担任送信事项。”^{[1]570}第二天接着记：“起草发出关于取消勤务员的命令。我的勤务员亦取消了。上午开各科长会议，讨论精兵简政后的编组问题。”^{[1]570}赖传珠在日记中的及时记录在陈毅向中央的情况汇报中也得到了证实：“勤务员全部取消，特务员或通讯员兼任之。炊事员十二人一个。”^{[20]288}可见，非战斗序列的勤务人员是编制调整和缩减的重点，这一做法在新四军各师中也得到了贯彻执行。

当时第二师就表示：“无事可做的人员确实很少甚至没有，连队小勤务取消，一律以两名通讯员兼代勤务工作。”^{[20]64}第四师也报告：“师部支部大会提出取消勤务员制度，并经军人大会讨论通过，现已取消。茶饭由炊事员送，集体吃饭。”^{[20]166}第五师更是如此：“私人勤务员一律取消。营以上干部同用一通讯员，营以下干部每六人至八人准用一勤务员。”^[21]各师的报告说明，他们在具体落实中普遍实行了赖传珠日记中所提到的由通讯员代替勤务员的精简方式。

还比如，针对特务团的精简，赖传珠在1943年8月30日曾记：“下午3时与军长[陈毅]略商直属队编组问题，分为3个大队。特务团缩小团制，谢祥军任团长兼政委。拨一个连给党校及供卫部。机关工作人员紧缩，以便应付情况。”^{[1]640}在8月31日记：“找特务团首长商讨执行新的编制，并进行动员工作。”^{[1]640}随后又记：“特务团进行缩编的动员工作。”^{[1]640}特务团的职责主要是保卫军部，执行警戒，因此也是精兵简政的重点。当时有地方就把“侦察、保卫、通讯排合编为特务大队”^{[8]470}。而赖传珠这三天的日记不仅勾勒出他的工作轨迹，而且突出了“缩编”后动员工作的重要性。新四军军部机关和直属单位通过连续进行四次精简，到一九四三年初，军直由原十六个单位、三千八百八十四人，减为九个单位、一千八百零三人；战斗人员比例增大，由原占百分之三十一·六，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五·四^{[20]288}。这为整个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作出了良好示范，极大地推动了新四军各层级的提质增效。

（三）“主力地方化”

1942年4月22日，中央在下发给各地关于总结精兵简政经验的通知中提到这样一个问题：“正规军与地方军是否已经划分？两者间的比例如何？民兵与自卫队占全人口的百分比，及其已起作用？”^{[10]378}这实际上是涉及在极端困难的斗争环境下，中共武装部队的结构和层次应该如何进行调整的问题。正如当时《解放日报》所指出的那样，“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在军事编制上就不

能不把正规军与地方军有恰当的比例:一方面使正规部队更能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另一方面更广泛地建立地方军与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以开展最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22]。

因此,在这场精兵简政运动中,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在规模、编制和比例上的重新调整是“精兵”方面的重要一环。赖传珠对此也有一些微观的记录,比如他曾在1943年1月6日记:“上午开各级首长会议,动员精简问题,我对部队编组发表了意见。”^{[1]596}这里提到的“编组”就是对部队重新调整的一种方式。虽然日记中并没有提到这是对具体哪类部队的“编组”,也没有提到“编组”之后的去向和行动,但是,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笔者发现,“主力地方化”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精兵”所秉持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这在新四军和华中地区的武装部队中有着鲜明体现。

“主力地方化”的目的是有效充实连队,这就要求主力部队抽调一部分出来加强下层,同时在此基础上力求精干。刘少奇就明确要求:“主力军除以一部地方化加强地方军之外,应力求精干。实行必要的缩编,减少机关,充实连队,裁撤老弱,并抽出大批干部来加以训练,提高与加强地方军。”^{[2]107}在具体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从新四军军部一直到各师、旅、团都通过“撤编”“缩编”“分编”等不同方式贯彻执行了这一决策。“一师部队为执行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一师及十八旅除编四个主力团外,其余均增强地方军,以便培养出许多新的兵团而坚持原地斗争。”^{[20]176}时任新四军第二师参谋长的周骏鸣也回忆:“为了贯彻党中央的精兵简政政策,使主力部队精干化,加强地方武装建设,1942年2月我师决定,以主力部队的1/3编入地方部队,将3个旅的9个团减为6个团,撤销第12、15团,第18团划归路西联防司令部建制。同时减少机关层次和人员,充实基层和战斗部队。”^{[8]565}第四师也是如此,十一旅“将第31团、第32团机关和直属连队撤销,加强充实到战斗连队,第31团编为第1、2营,第32团编为第3、4营,直属旅指挥”^{[23]169}。这充分表明,为充实连队而采取的“主力地方化”方针在新四军内得到了普遍实行。

这样一来,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有了更为紧密的互动。中共不仅实现了对主力部队的“精干化”,同时也发展了地方部队,加速巩固了地方政权。淮海区的负责人就表示:“主力地方化,在淮海区的特点,实际是地方武装主力化了。”^{[24]40}黄克诚也总结道:“我们在实行主力地方化过程中,先后以四个主力团分散编入地方部队,使地方部队充实了骨干。这样一来,迅速加强和巩固了地方部队,使地方部队主力化。地方部队升级为主力部队后,又重新组建起新的地方部队。”^[24]由此可见,一部分主力部队转为地方部队,一批干部到区、县地方武装充当骨干,这既使主力部队更加精干,也促使地方部队在主力部队的带动和帮助下发展壮大起来,“精兵”带来的转变让新四军的体制更适合于分散的敌后游击战争。

三、“抓善后”与“疏解干部”

精兵简政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做好精简后的人员处理工作,这其中“编余干部”这个特殊群体的疏解善后工作尤为重要。因为这涉及大批干部的具体去向和切身利益,如若处理不好便会引发一系列矛盾。以赖传珠的视角看,新四军高层组织成立“善后委员会”,形成专人专管的工作体系,这在赖传珠的日记中有详细记述。

1942年10月11日,赖传珠记:“讨论精简后人员处理问题。”^{[1]568-569}几天后的10月17日又记:“上午,讨论精兵简政组织分工、人员处理原则,组织善后委员会;设专任人员进行处理,由张凯、汪晓云、朱迅、石玉田、戴济民等5人组成,以张为主任。下午向饶[漱石]、陈[毅]汇报直属队精兵简政的情况及一些人员处理的意见等。”^{[1]570}关于精简后的处理原则,从中央到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都有明确详细的规定,力图通过多渠道合理安排好他们的去向。这是对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内部复杂矛盾的一次考验,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历次党和国家机构的重大精

简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具体来看,当时对于干部疏解的办法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尽可能充实基层,这是党中央一直提倡的一种安排途径。《中央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中就明确提出,要把“大批干部人员及知识分子派到区乡去,派到空虚而需要的部门去,派到接敌区游击区敌占区去。尤其是知识分子须经过下层锻炼。大批军事政治干部派到游击队中去”^{[10]466}。这一点在赖传珠的日记中也有所记述,他在1942年12月3日记:“上午黄[克诚]师长来谈盐阜区如何应付敌人扫荡问题。决定将抗大、上干队、党校学习的干部,提前结业分配到各师去。继续紧缩直属队机关工作人员。”^{[1]584}一批精简后的干部及知识分子充实到战斗一线,这样不仅可以有效紧缩上级机关,也有利于提高基层部队指战员的素质,从而增强部队战斗力。

在反“扫荡”的战争实际中,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各地区也都切身感到这种方式的正确性,淮海区的负责人表示:“淮海有九县,只有一个军分区直接领导,很不方便,机关又大,下层工作很弱,而坚持工作的中心是区,区却是最薄弱的,方针政策贯彻不下去,于是我们分成X个单位(党、军,设中心县委),将机关中强的干部大批派到下面去,尤其到区里去,半数降级使用。”^[25]亲历这场精简运动的新四军第三师八旅负责人也回忆:“旅机关由原来的601人减少到180人,将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到基层,加强连队建设。”^{[23]30}从整体效能看,这种处理方式使上级机关和下层连队产生更多互动,新四军整体的指挥体系和力量分配也能更加适应分散的游击环境。

二是吸纳进各级各类学校。当时华中局明确发文指出,“在精兵简政中干部的调整及编余人员的处理应当特别审慎注意。抽调大批有工作经验的干部到党校、抗大学习,不得降级使用,抽调大批可以造就的事务人员及杂务人员送入学校学习,对有专门技术的人才应调到其他部门工作或给以进一步学习机会”^{[11]184}。这表明,学校系统是吸纳精兵简政后保存干部的一个重要渠道。中央对此表示全力支持并指出:“各地干部凡可能来延安的,由中央局、分局筹划派送大批来延保存学习,保存干部仍是目前要注意的任务。”^{[10]466}时任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王必成回忆当时他们的精简情况:“全旅精简100多人,另有110名干部进华中局党校和进军部抗大学习,另一部分调延安中央党校学习,50名干部充实到地方部队。”^{[8]462}由此可见,“入学”是当时精简后疏解干部去向的一个重要渠道。同时,从这些历史材料中我们能够切实感受到,精简后的干部去向问题是当时中央和新四军军部普遍关注的重点。中国共产党秉持“人尽其才”“分类指导”“具体细致”等原则,确保精简工作的顺利进行。

但是,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是会存在一定偏差,这一点在赖传珠日记中也能够找到一丝历史痕迹。当时,在其他抗日根据地都曾发生过对编余人员处理过于简单,缺乏足够的耐心说服教育,从而导致他们对党和政府产生某些不满的情绪。赖传珠也记录了发生在新四军的这样一个案例。1944年2月5日,赖传珠记:“收发陈新,一个二方面军的老干部,因在苏中区被敌伪俘去,打伤回来。当时该连怀疑他有问题,精兵简政时,三地委组织部长发他路费回家。到军部任收发表现平凡。对上述事情不满,此次卖掉1条裤子,变买1支新民笔,得洋300元。大约畏惧处分,自己狭隘,于上午自杀,留下信一件亦证明这些问题。”^{[1]677}这个案例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新四军精兵简政过程中也存在一定问题,比如工作不细致、不到位等。这也从侧面表明,精兵简政既是一项复杂的组织工作,又是一项艰巨的思想工作。

其实,针对精兵简政善后工作的重点关注对象,当时新四军的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对此进行过专门总结。时任苏中区党委组织部长周季方就曾撰文指出:“在处理干部中,应该特别审慎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政治上落后,思想意识很差的,另一种是战士与杂务人员中之老弱及小孩。这两种人最易被人忽视,有些同志往往会采取单纯的命令遣散,或站队讲话发钱回家的方式,于是就引起少数人的反感,大哭大叫,散布不满空气,说‘新四军要人就要,不要就一脚踢开’,等等。”^[26]

这种处理不当的后果就会导致一些不明白精兵简政政策的人,对裁撤人员表示同情,而敌伪奸细也就可能利用这些不满情绪来蛊惑他们攻击反对党的政策和主张。在苏南根据地茅山地区工作的汪大铭在对精兵简政工作进行反思总结时也讲到:“在处理精简政策中,应首先着重思想上政治上的教育解释,使大家明白现在的精简是党爱护干部的政策,不要造成不满及反感情绪。”^{[9]577}赖传珠在日记中的记录为我们了解这种情况提供了具体案例。所以说,精兵简政确实是一项敏感度高、细致而复杂的工作,尤其是精简之后的干部如何妥善处置,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纰漏。

精兵简政是一项综合性的部队和机关改革工作,它绝不仅仅是缩编减员的问题,经过调整之后的部队体制如何理顺,业务职责应当如何重新划分,工作作风和效率如何提高,精简下来的干部如何妥善处置等,都是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赖传珠就曾在日记中记录:“上午召开各科长会议,谈及关于精兵简政后组织生活制度,改进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等问题。”^{[1]571}简而言之,要根据不同环节的具体情况进行分类处置,同时要充分把握政策的全面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

四、结语

毛泽东曾说:“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党中央指出了这个困难,叫我们提起注意绕过这个暗礁。”^[27]赖传珠日记表明,来自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现实困境确实是实施精兵简政的大背景,新四军当时所面临的具体情况在其日记中有着详细而连贯的工作记录。赖传珠作为新四军高层领导的重要一员,对党中央与新四军的互动讨论,对新四军及华中地区精兵简政工作的酝酿、落实和监督等环节有直接参与,他的日记为我们观察和认识这个中共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提供了独特材料。通过解读赖传珠日记,笔者感到日记这种史料类型对再现历史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日记的“及时性”和“生动性”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历史的温度,丰富和补充了许多中共革命的历史细节,弥补了档案文献记载的不足。此外,日记的“连续性”充分折射了战争年代的时代风貌,侧面反映了中共革命的基本走向和发展变迁。当然,日记中的一些记录内容对于后人来说难于探因,想通过日记中的新材料得到与既有历史认识相异的结论也并非易事。因此在使用日记时还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如考证日记真伪及版本差别、与其他类型史料进行互证互析、合理运用一定的历史想象力、坚持“大历史”整体性原则等,只有这样才能探得更多历史真相,展现更加丰富多面立体的中共革命历史。

参考文献

- [1] 《赖传珠将军日记》编辑小组. 赖传珠将军日记[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3] 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国际友人笔下的新四军[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
- [4]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铁流:第12册[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283.
- [5]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 苏北抗日根据地[M].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159.
- [6]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 苏中抗日根据地[M].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206.
- [7] 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新四军·参考资料:3[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23.
- [8]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新四军·回忆史料:1[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 [9] 汪大铭. 汪大铭日记(1939—1945)[M]. 镇江:中共镇江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句容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1987.
- [10]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1]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档案馆. 中共中央华中局[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
- [12] 彭雪枫. 彭雪枫家书记日记选[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
- [13] 潘流. 潘流同志日记[M]. 内部资料,1988:88.

- [14] 社论. 澈底实行精兵政策[N]. 解放日报, 1942-08-03(1).
- [15] 李一氓. 反“扫荡”的一年与十大政策[N]. 淮海报, 1943-11-19(1).
- [16] 陈毅. 陈毅军事文选[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6: 208.
- [17]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437.
- [18] 毛铎. 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N]. 解放日报, 1942-08-19(2).
- [19] 欧远方, 王克, 王志铨, 等. 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 第2辑[M]. 合肥: 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 安徽省档案馆, 1985: 109.
- [20] 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新四军·文献: 8[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6.
- [21] 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新四军·文献: 9[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6: 44.
- [22] 社论. 精兵简政[N]. 解放日报, 1941-12-06(1).
- [23]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新四军·回忆史料: 2[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0.
- [24] 黄克诚. 黄克诚回忆录[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9: 294.
- [25] 马洪武, 等.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 第6辑[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100-101.
- [26] 马洪武, 等.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 第7辑[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106.
- [27]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881.

Examining the New Fourth Army's Simplification and Streamlining Through Lai Chuanzhu's Diaries

CHAI Yuzhen

(School of CPC History & Party-Build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Simplification and streamlining was an important strategy implemen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leading the resistance behind enemy line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coherent records in Lai Chuanzhu's diary illustrate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New Fourth Army at that time, such as the shortage of military supplies, financial difficulties, and reduced operational space. In such a context, the leadership of the New Fourth Army adopted "fixed personnel and fixed organization" as the basis, combining the directives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to streamline, reduce personnel, and reorganize the army, realizing the localization in terms of military structure and level. At the same time, Lai's diary contains relevant records regarding personnel management after the streamlining of the troops, including specific measures like organizing a trouble shooting committee, and details and cas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cadre adjustment. Lai Chuanzhu's diary provides a unique avenue to restore and reflect on the background, process, and methods of the New Fourth Army's simplification and streamlining, worth detailed exploring and summarizing.

Key words: Lai Chuanzhu's diary; New Fourth Army; simplification and streamlining

〔责任编辑:朱 根〕